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学刊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24 辑

2021(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རྒྱལ་ཁོག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主编 霍巍 石硕
常务副主编 张长虹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主席 巴桑旺堆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委员 才让太 (中央民族大学)

霍 巍 (四川大学)

石 硕 (四川大学)

沈卫荣 (清华大学)

熊文彬 (四川大学)

张 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多吉旺秋 (德国汉堡大学)

范德康 (美国哈佛大学)

马休·凯普斯坦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美国芝加哥大学)

滕华睿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谢 萧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编辑 陈 波 嘎尔让 华青道尔杰 (张延清)

许渊钦 杨清凡 玉珠措姆 (金红梅)

张长虹

编务 孙昭亮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Editors-in-chief Huo Wei, Shi Shuo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Board Pasang Wangdu (*Chair,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Tsering Tha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uo Wei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i Shuo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en Weiro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Xiong Wenbin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Zhang Yu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Dorji Wangchuk (*Hamburg University, Germany*)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Harvard University, U.S.A.*)
Kapstein, Matthew 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Tuttle, Gra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A.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Editors Chen Bo, Gaerrang,
Pelchan Dorje (*Zhang Yanqing*),
Xu Yuanqin, Yang Qingfan,
Yudru Tsomu (*Jin Hongmei*),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Assistant Sun Zhaoliang

目 录

敦煌藏文文书 P.t.1077《都督为女奴事诉状》研究	陆离 / 1
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中观文献分类及其特点研究	仁青吉 / 17
吐蕃时期《维摩诘所说经》汉藏译本对比	杨本加 / 32
拉萨小昭寺源流考	刘凤强 / 44
从夏扎·旺秋杰布的《桑耶寺志》探析桑耶寺修缮的历史	龙珠多杰 崔宇 / 55
十力吉祥友及其《有为无为抉择》的时代简注(英文).....	范德康 / 67
拶也阿难捺和贡却僧格生平考补(英文)	聂鸿音 / 74
雍增·益希坚赞所造《一世班禅大师克主杰传记》译考	夏吾李加 还格吉 / 86
有关班禅世系研究的概述	李若虹 / 126
宝相楼一楼明间唐卡研究	文明 / 148
西藏牦牛博物馆馆藏铁柄牦牛纹铜镜及相关问题考	薛江 / 173
新发现的清代噶伦索康·斯觉次旦传记写本考述	永中久美 / 190

《卫藏图识》作者、材料来源及文献价值考述	杨学东 / 205
19 世纪中叶法国巴黎外方会早期进藏活动史考	刘瑞云 孙蕊 / 216
对几种外文藏文教材的评介——兼论古典藏文教学	马洲洋 / 243

译文

吐蕃王室世系、王位继承以及政治联姻研究

..... [美] 杜晓峰 著、张旭 武显云 译、杨铭 校 / 271

吐蕃禅宗：一个遗失传统的发现

..... [英] 沙木·冯·谢克 著、牛宏 寇金花 译、张长虹 校 / 288

斯比提岩画概述

..... [美] 约翰·文森特·贝勒扎 著、永保藏 译 / 307

嵌史入石——拉达克早期佛教石刻艺术

..... [德] 平措多杰 著、张中亚 译 / 332

摘 要

/ 355

Table of Contents

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P.t. 1077: A Statement of the Claim Concerning To tog's Female Slave <i>LU Li</i>	1
A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in the Dunhuang Tibetan Documents of <i>Madhyamaka</i> and its Features Based on the Tibetan Collection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i>Renqing Ji</i>	17
A Comparison of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Versions of the <i>Vimalakīrti sūtra</i> during the Tubo Period <i>Yangben Jia</i>	32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Ra mo che in Lhasa <i>LIU Fengqiang</i>	44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Monastery Based on Bshad sgra Dbang phyug rgyal po's <i>Bsam yas Annals</i> <i>Lhun grub rdo rje and CUI Yu</i>	55
A Brief Note on the Date of Daśabalaśrīmitra and his <i>Samṣkṛtāsamṣkṛtaviniścaya</i> <i>Leonard W.J. van der Kuijp</i>	67
Complementary Notes on the Biography of Jayānanda and Dkon mchog seng ge <i>NIE Hongyin</i>	74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the first Paṅ chen Lama Mkhas grub Dge legs dpal bzang po (1385-1438) <i>Sha bo klu rgyal and Dpa' mkhar skyid</i>	86
Overview of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the Paṅ chen Lamas <i>LI Ruohong</i>	126
A Study of the Thangkas in the Main Hall of the First Floor of the Baoxianglou <i>WEN Ming</i>	148
A Yak-Pattern Bronze Mirror with an Iron Handle Housed in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and Related Issues <i>XUE Jiang</i>	173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of the Biography of Bka' blon Zur khang Sri geod tshe brtan (1766-1820) <i>Gyung drung 'gyur med</i>	190
A Study of the Author, Sources and Value of the Book <i>Weizang tuzhi</i> <i>YANG Xuedong</i>	205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s Early Activities of Trying to Enter Tibet in the Middle 19th Century <i>LIU Ruiyun and SUN Rui</i>	216
A Review of Several Tibetan Textbooks—and the Approaches to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Tibetan <i>MA Zhouyang</i>	243
Succession and Marriage and the Tibetan Royal Line <i>Brandon Dotson,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Xu and WU Xianyun, Proofread by YANG Ming</i>	271
Tibetan Zen: Discovering a Lost Tradition <i>Sam van Schaik, Chinese translation by NIU Hong and KOU Jinhua, Proofread by ZHANG Changhong</i>	288
The Rock Art of Spiti — A General Introduction <i>John Vincent Bellezza, Chinese translation by Yongbao Zang</i>	307
Embedded in Stone — Early Buddhist Rock Art of Ladakh <i>Phun tshogs rdo rj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Zhongya</i>	332
ABSTRACTS	355

吐蕃禅宗：一个遗失传统的发现^{*}

[英] 沙木·冯·谢克 著
牛宏 寇金花 译 张长虹 校

内容摘要：本文为《吐蕃禅宗》一书的导论，探讨了在藏地受指责、在汉地被遗忘的一个佛教传统——吐蕃的禅宗。对于藏文禅宗写本的理解，在解读文本本身的同时也不应忘记文本的物质属性，即将文本视为实践。敦煌发现的汉、藏文禅宗写本呈现的是九、十世纪一种包容性的、不断发展的状态，是对以前发生的事件的汇聚。从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到九世纪上半叶，在佛教被采纳为吐蕃国教的这段时间里，禅师很可能在藏地吸收佛教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摩诃衍，汉地禅宗顿门的代表人。敦煌禅宗写本的发现让我们重新思考吐蕃时期“顿渐之争”的结果和方式，几百年后的《拔协》等藏文历史文献的记载反映的并不一定是当时的历史事实。直到十三世纪，禅宗的文本和实践似乎在西藏仍有传承。吐蕃的禅、敦煌的禅与汉地其他地方的禅一样，都是地方性的。

^{*} 沙木·冯·谢克 (Sam van Schaik) 于 2010-2012 年在大英图书馆负责研究整理敦煌藏文文书，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关于敦煌藏文禅宗文书的整理和翻译工作，最终写成《吐蕃禅宗：一个遗失传统的发现》(*Tibetan Zen: Discovering A Lost Tradition*, Boston & London: Snow Lion, 2015) 一书。经作者授权同意，本文翻译了该书的前言部分 (原书第 1-23 页)，以饷读者。

一个遗失的传统

曾经在藏地受指责、在汉地被遗忘的吐蕃禅宗几乎彻底遗失了。当汉地禅师在吐蕃王国巅峰之时被邀请到西藏时，汉地禅宗首次于八世纪传入西藏。根据藏文传统史书记载，在吐蕃王廷，印、汉佛教徒产生了教义上的分歧，于是吐蕃赞普采取正式辩论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当辩论结果是印度一方获得决定性胜利时，禅师们被送回了汉地。尽管这一故事受到质疑，但禅宗显然在西藏衰落了，它的原始文本也几乎被遗忘殆尽。

20 世纪初，在位于中亚的中国敦煌，随着一座尘封的充满古代写卷的石窟被发现，情况发生了改变。这座石窟中发现的藏文文书被断代为九、十世纪，是目前所知藏传佛教最早的资料来源。在这批藏文写卷中，约有 50 篇被认定是关于吐蕃禅宗的仅存原始文本，是了解吐蕃禅宗的主要资料来源。这些禅宗写卷可以让我们概览到八到十世纪早期禅宗的状态，同时也是研究中国汉地、日本和朝鲜禅宗的重要资料。不仅如此，吐蕃禅宗似乎已经发展为一种独特的传统，融合了密教元素，人们对这种奇特的混合宗教知之甚少¹。

那个敦煌藏经洞是佛教洞龕建筑群的一部分，开凿于中亚沙漠边缘的崖壁上。我们对藏经洞知之甚少，既不知其中为何装满写卷，也不知其为何封存。我们只拥有这一历史事件的结果，那就是成千上万卷的汉文、藏文、突厥文、梵文和其它语言文字的写卷，同时还有佛教绘画和寺庙经幡。实际上，洞名“藏经洞”是一个有误导性的名称，因为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这些写卷并没有形成任何一种有序的图书收藏。除了佛教经卷和论述，还有笔记、购物单、书写练习、信件、契约、画稿，以及一些粗浅的打油诗之类的手稿。

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经过有序地、认真地拣选过的藏经室，不如说它是所在城镇及其周边寺庙日常生活记录材料的杂物堆。对在过去一个世纪曾对洞中文书进行过研究

1 虽然 Zen 是一个日语词汇，在本书中，我将它作为一个通用的术语，对应在汉语、藏语、日语、韩语及其它语言传统中的使用。Zen 是根据汉语的日语发音来的，它源自汉语对梵文 *dhyaṇa* (meditation, 禅定) 一词的音译，也有可能是来自综合了汉语的 Chan 和韩语的 Son。而藏语对该梵文词汇一般采用意译，译为 *བསྐྱེད་ལྷན་པོ་* (Samten, 禅定)。所以，本文使用“Zen”这个词是为了简化，超越这些语言差异。注明一下，在突厥语和西夏语中也存在 Zen 文本，但研究不多，见茨默：《古突厥佛教中的〈圆觉经〉》，载马克瑞和那体慧编：《跨越边界的佛教》(Peter Zieme, “The Sūtra of Complete Enlightenment in Old Turkish Buddhism.” In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 eds. John R. McRaec and Jan Nattier), *Sino-Platonic Papers* 222, 2012: 192-211。索罗宁：《继承唐代的西夏佛教：西夏文本“镜史”中的教法分类》(Kirill Solonin, *The Tang Heritage of Tangut Buddhism: Teachings Classification in the Tangut Text “The Mirror.”*) *Manuscripta Orientalia* 6, no. 3, 2000: 39-48。另外，Zen 这一单个术语的使用，并非暗示着有一个跨越时空而不变的传统。

的学者来说，这似乎成为了一种障碍，但对我们理解一个曾鲜活存在而后湮灭的传统研究项目来说，这是一个优势。在藏文传统中，有一个包含了数百卷经文、注疏和论述的佛教大藏经。但是藏文大藏经并没有体现出宗教传统的日常实践。她的遴选是由编纂者和施主们决定的，也许是受传统限定，更多地与神化经典的政治有关，而非与日常宗教生活相关联。在大藏经里，相似的文本是按标题分组的，这些规范化的文本，却在大藏经之外，显得更为混杂和变异。

这也是敦煌洞窟里所藏写卷的一个优势。它们也许是“神圣的废弃物”——第一位造访藏经洞的欧洲人斯坦因（Aurel Stein）这样认为——它们没有经过精心筛选和编排以呈现一种传统的理想化形象，如大藏经收藏那样。在这堆无序的杂物中，文本相互抵触，以某种从不会出现在冰冷而虔诚的大藏经中的方式被混合在一起。我们可以问，或许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人们用这些文本做什么？怎么使用？

让我们举个例子：现存最早的藏文禅宗写本。这份残卷的发现不是在敦煌，而是在敦煌以西更远的地方，在一座吐蕃戍堡废墟内。这个戍堡，如今以其突厥语名称——“米兰”被世人周知，它由吐蕃人建造，在八世纪中叶到九世纪中叶被用于保卫他们帝国的边界。传统的解读这个独特写本的方法是：转录禅宗文本，附上它被发现的位置和可能的书写年代范围，然后在纯文本的范围内与其他类似的无相关背景的文本进行比较。

与其急于离开戍堡，仅将文本拿在手中，我们不如将目光更多停留在考古学家斯坦因发现该经卷时一起出现的其他物品。有一些是士兵的物件：来自盔甲上的皮带，一个箭头，一个皮质箭柄。还有一些任何人都有可能使用的东西：一只皮袋，一把梳子，一把钥匙，一把木质手柄的匕首，一个六面的骰子。还有一些用于文本书写的物品：一只分裂的尖头笔，三枚骨柄印章，用于官方的信件和合约中。这些物品伴随着这件最早的藏文禅宗写本上千年，我们不应如此迅速将其割裂开来。

至于那些出自戍堡的其他写本，大多是吐蕃王国各前哨间的官方通讯。较短的每日讯息写在木条上进行传递，有时也将两块木条用绳子绑在一起并用印泥封住。当收到供给请求时，木条就会被标记，底部右角被砍去；当供给送达时，被砍下的一角可以当作收条，与最初的命令相对照。将戍堡中所发现的物品与这些官方文件联系起来，试着找出人们使用它们的目的，通过这些我们逐步靠近它们。这些物品背后的行为模式是什么？骰子是用来占卦还是赌博？或者二者皆有？士兵们多久使用一次这些弓箭？是他用笔来快速书写信息，还是戍堡有训练有素的缮写者？一旦它们被写出，谁把它们带给最近的指挥部？谁带回食物和补给？尽管这些问题不会有很明确的答案，但这种询问似乎十分显见、合理。

因此，如果我们对米兰出土的禅宗写本问同样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写本是从哪个文献中摘出的？），如同我们想要问关于骰子、箭和皮袋等问题。我们会问：它们是怎样做出来的？谁把它们带到这儿？谁在用它？为什么而用？正如它们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这些问题都会成为更广泛的行为模式的问题。从一个复杂的遗址中获取一批物品，并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通过这样我们或许能够辨析出这些模式。这让我们不仅考虑到文本的意义，还有它们的用途及其所包含的实践内容。

藏文禅宗卷子是因为某些目的被带到米兰的，因为那儿没有专门制作纸张的设备。当然，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其目的，但是通过对文本的密切关注，可以发现一些线索。例如，把卷子翻过来，我们发现在其背面写有另一份文本，比起禅宗文本写得略为杂乱。这是一个密教文本，是关于如何供奉佛教神祇以完成息、增、怀、诛四业的解释说明，远在戍堡的士兵们可能会对这些感兴趣。因此，这份藏文禅宗文本可能只是随身携带，而不是被带去修习。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修习的一部分，被一个俗人或僧人带来。但是我们果真可以从像这样的物品去到他们曾参与其中的日常实践中吗？

文本与实践

对于藏文禅宗写本的解读，将其作为日常社会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不仅意味着要寻找能够描述社会实践的文本材料，还意味着将所有的文本视为实践，其具体表现即为实物写本。为了显示这一工作的可能性，让我们看看在藏文禅宗写本中最重要的、被广为研究的 Pt.116 号文书，它是集成了约十个不同的文本文献。

它是一部书法优美的大部头经折装写本，共 124 页。每页长 30 厘米，宽 7 厘米，每页书写四行文字。随着册页的展开，可以直接阅读面向你的两页，随着阅读往下翻页；当你翻阅至册页末尾时，你可以将整个册页翻转，用刚才同样的方式阅读其背面。制作一本上百页的经折装册页，需要将很多纸张折迭、涂胶和粘合。这种装帧方式在公元九世纪中叶开始流行，并似乎格外受敦煌地区藏语使用者们的青睐；在英藏和法藏敦煌文书中大约有 260 件采用了这种装帧形式，其中 90% 是用藏文书写的。

Pt.116 号文书中的第一和第二个文本实际上并不是禅宗文本。它们是大多数传统中都非常流行的佛教文本——《普贤行愿品》和《金刚经》。大概由于这两个文本无处不在，该写本的复制件——构成了大多数研究的基础——简单地就将前 107 页忽略了。从而将前两个文本、这些文本被收录的原因以及由抄写员辛苦抄写的内容等，统统移除了，不予考虑。

在文本解读中，甚至是最直接的语境中，一旦某个文本被抽出，其他文本与这一文本的密切关系就会被遗忘。因此大多数关于 Pt.116 号文书的研究都聚焦于十个文本中的某一个，对其他文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给予关注，而对文书开头的两个“非禅宗”文本更是如此。事实上，这两个文本对于理解整部文书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会使得讨论该部文书的制作原因及用途有迹可循。文书开头部分《普贤行愿品》的出现表明，该文书是被用于一种仪轨，受菩萨戒的仪式。这是只在大乘佛教中才有的系列誓愿，讲的是菩萨的心愿——帮助一切众生悟道。受菩萨戒的仪轨起源于印度，但在中国特别流行，大量的受戒仪式在专门建造的法坛上举行。

受菩萨戒的仪式补充了寺院中受分别解脱戒的仪式。菩萨戒仪式可以被世俗中人领受，也可以被比丘和比丘尼领受。不仅如此，这一形式优于寺院的剃度，仅需一名上师就可以认证。这样就使得富有感召力的金禅师和神会禅师利用戒坛来讲法并指导教团进行修行成为可能。

这类受戒仪式的流行与禅宗传承在公元八世纪时出现的“自我意识”相一致。因此，正如韦闻笛 (Wendi Adamek) 提出的，“禅宗可以说萌生自菩萨戒坛中”。² 菩萨戒的受戒仪式发生在禅宗传承的语境中，并扩展到包括对禅宗修行风格的介绍。这类法坛仪式在禅宗中的重要性同样在敦煌文书中得到了佐证。例如，最流行的早期禅宗文本之一——《坛经》(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数个版本)，就是围绕六祖慧能的受戒传法编纂的。另一部慧能弟子神会的法坛讲法，也在敦煌写本中被发现。

Pt.116 中的文本编排是如何显示戒律仪式的来龙去脉的呢？《普贤行愿品》是一部以第一人称作愿文，表达度化一切众生、祈求福报的愿望。这是一种在佛教实践中通过领受菩萨戒仪式而具备了固定形式的菩萨愿。这部文书开端所出现的《普贤行愿品》，能够证明这些写本是被用于这种仪式的第一个线索。愿文之后是《金刚经》——是一部阐述“空”概念的流传最广的经文之一，认为一切相互依赖，所谓无是一种本性。在这部经文中，佛陀采用反复“称颂菩萨道的殊胜和佛陀的功德，同时又否定它们的存在”这种相矛盾的论述。这是对自与他、有与无等二元观念的挑战。这种刻意矛盾的传道方法对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开头讲述慧能如何成为禅宗六祖故事的《坛经》中，《金刚经》同样占有核心地

2 韦闻笛：《无住大师的教法：禅与非宗教的宗教》(Wendi Adamek, *The Teachings of Master Wuzhu: Zen and the Religion of No-Relig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33；还可参见韦闻笛：《传播的奥秘》(*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该书详细讨论了与禅宗传承有关的概念仪式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

位。据说慧能是在市井中听到有人诵读《金刚经》而离家前去参礼五祖。在后续的叙事中，禅宗五祖以讲授《金刚经》的方式将法衣授予了慧能。在这段简短的传记之后，《坛经》开始转入慧能在一个受戒仪式上的讲法。这一仪式以皈依佛、法、僧开始。接下来是菩萨愿和对“空”的解释，再一次特别提到《金刚经》。

因此，Pt.116 中的第一和第二个文本反映出了受戒传道的主题，就像我们在《坛经》中所发现的一样——授菩萨戒和解释空性。接下来是与我们所读到的 Pt.116 其他文本同样的范式——介绍禅宗的基本主题，众生皆有佛性，而后是关于禅定的指导，最后以鼓舞人心的偈颂而告终。这一仪式经常会是提前安排好的佛事的中心仪式，它为僧侣和俗众前往现场预留了时间，仪式会持续好几天或几周，授戒之后是闭关禅修³。

我们来看看 Pt.116 中的其它文本，它确实相当长，这表明它可能不单单是为了从头到尾阅读。这部文书中的一些文本是禅师语录的转录摘选和经文片段，另一些是问答形式的写本，其中一些个体片段很容易被提取出来。这部文书很可能是被用作某种仪式的原始素材，而不是严格的仪轨，就像佛教其他宗派或其他宗教传统中被用作教义问答书和经文片段集成一样⁴。另一个需要仔细关注的文书所提供的线索是，有这样一种情

3 关于《坛经》的翻译和研究见杨波斯基的《六祖坛经》(Philip Yampolsky, *The Platform Sū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对这部文献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经典分析 (Yanagida Seizan, *Shoki zenshū shisho no kenkyū*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works of the Zen school]), Kyoto: Hōzōkan, 1967, 他认为这个经文最初的核心是授“无相戒”和随后的禅定指导 (section 20-30), 以及传承 (section 51), 其原始文本的作者是一位生活在八世纪名叫“无行法海”的僧人, 参见马克瑞:《柳田圣山有关中国禅宗研究的代表作》(John R. McRaec, “Yanagida Seizen’s Landmark Works on Chinese Ch’an.”) *Cahiers d’Extrême Asie* 7, no.7, 1993: 51-103; 还可参见安东平关于敦煌写本中不同版本《坛经》的研究, 见安东平:《〈坛经〉是经吗?——敦煌〈坛经〉写本的文本特征研究》, 载《汉文写本研究: 从战国时期到 20 世纪》(Christoph Anderl, “Was the Platform Sūtra Always a Sūtra?—Studies in the Textual Features of the Platform Scripture Manuscripts from Dūnhuáng.” In *Studies in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20th Century*, ed. I. Galambos), Budapest: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2013: 121-176。安东平认为“坛经”这个术语最早来源于《金刚经》, 之所以被如此称呼是因为其在禅宗受戒仪式中的核心作用。关于神会戒坛说法的翻译参见李华德:《神会的传法》(Walter Liebenthal, “The Sermon of Shen-hui.”) *Asia Major* 3, no.2, 1953: 132-155。最澄 (Saicho, 767-822) 和圆仁 (Ennin, 793-864) 的日文书目中也包含有一系列暗示这些戒坛仪轨的文本, 菩萨戒后面紧接着的是相关经文和禅宗文献, 见林佩莹:《禅的戒律与传承: 九世纪东亚的跨文化观察》(Lin pei-yin, “Precepts and Lineage in Chan Traditio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Ninth-Century East Asia.”) PhD dis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1: 42-53。韦闻笛在《传播的奥秘》(2007: 197-204) 中关于仪式的拓展性有所讨论, 当中也包含了宗密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个段落;《历代法宝记》提到一次持续“仅三天三夜”的戒律闭关 (韦闻笛:《传播的奥秘》, 2007: 348)。

4 巴利文大藏经中文献的口述背景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 无论是其口述源头, 还是其作为晚期传统讲法使用的资料来源。参见兰格尔:《传法研究与佛教: 以斯里兰卡的讲法为例》(Rita Langer, *Sermon Studies and Buddhism: A Case of Sri Lankan Preaching*),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2013, 对上述讨论进行了概述并研究了斯里兰卡佛教传统中的讲法实践。

况——有人已经用小十字在文中不同地方进行了标注，这可能是使用一个特定段落时的视觉提醒⁵。

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去推测，为什么某个人，或者是几个人，花费时间和财力来制作这部文书？为什么它由于被使用而变得破旧许多？为什么它值得再次修复？它是为某种目的而造；它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告诉我们关于吐蕃禅宗的修习和文本内容告诉我们的一样多，因此就显示了将文书看作物质的价值，这在人类实践中扮演着积极角色。当然，文本本身也是解读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阅读文本的同时不要忘记文书的物质属性，那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文本的使用有着更为丰富的理解。

在西方对禅宗感兴趣的早期阶段，它被认为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仪式。如今，人们已经普遍接受，这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由新教徒的感性和反建制政治所勾勒出的虚假画面。实际上，正如最近一本禅宗仪式书的编者所说，“禅宗生活绝大多数是一种仪式生活”。⁶

当然，去唤起一种已经覆灭的仪式生活的传统并不容易。本书提供了藏文禅宗文本的译文，同是我也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去复原他们曾经参与其中的场景，通过这样做来更加接近它们所发挥作用的修行范围。可能有关这种方式的一个词，我正在使用的一个术语——“仪轨”（ritual）在这里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很多人注意到的，这个词可以指代很多事物。在这里，我使用这个术语专指一类特殊的实践——一种群体活动，自觉以常规的方式进行，以达到目的。这种用法也类似于“仪式”（ceremony）一词，由此，我交替使用这两个词⁷。

本书所附的译文中，以及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仪式与日常诵读实践，我们也将关注讲授的角色和接受对象，写本在这方面也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并且，通过上下文，我们将看到实践的合法性以及它在传统中的定位是如何成为禅师们使用的最重要的启发式方法

5 这种标记在讲法或仪轨文本中的使用，在敦煌汉文文献中非常常见，但是在敦煌藏文文献中以前没有注意到，参见梅维恒：《学仕郎与俗语叙述故事的抄写：敦煌写本目录》（Victor Mair: “Lay Students and Making of Written Vernacular Narrative: An Inventory of Tun-huang Manuscripts.”），*Chinoperl Papers* 10, 1981: 5-96。安东平已经讨论了《坛经》写本中出现的“表演标记”（2013: 169）。巴瑞特：《非法世界中的佛教戒律：有关临准度牒丑闻的评论》，载博迪福特编：《前行：佛教戒律的想象》（T. H. Barrett, “Buddhist Precepts in a Lawless World: Some Comments on the Linhuai Ordination Scandal.” In *Going Forth: Visions of Buddhist Vinaya*, ed. W. M. Bodiford），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116 也提到了《坛经》中的进一步使用：拥有写本被认为是禅宗家系成员的证明。

6 怀特：《导论：对禅宗仪式实践的反思》，载海涅和怀特编：《禅宗仪式：实践中的禅宗理论研究》（Dale Wright,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Ritual Practice in Zen Buddhism.” In *Zen Ritual: Studies of Zen Buddhist Theory in Practice*, eds. Steven Heine and Dale Wrigh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4。

7 关于“仪式”（ritual）一词含义的调查，参见林佩莹：《禅的戒律与传承：九世纪东亚的跨文化观察》导论部分，2011。

的。通过这些写本，我希望传达一个想法，一个新兴的传统是如何被禅师们传播的？是如何通过团体仪式得到加强和扩展的？是如何通过禅定得到内化的？是如何得到施主支持的？是如何抵御外部的威胁的？

中国汉地的禅

现代学术界有一个相当一致的结论，即在十世纪晚期宋代之前，没有禅这个“宗派”。而是，存在一些各种各样的团体——一般是由一位上师及其门徒组成——教授和修习一种强调禅定的方法（*dhyāna* 或汉语中所说的“禅”）⁸。因此，如果我们讨论在此之前的禅（包括吐蕃的禅），我们应记得将其看作一个包容了各种实践内容的伞状术语，这些实践内容不是由于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而是由于族类的复杂相似性而聚合在一起的。这些实践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何禅修的指导、开悟自性的教法、授菩萨戒的仪式，以及在绝大多数情况但并非所有情况下包括菩提达摩像在内的祖师传承等。不过，与后来成熟的禅宗传统相关的激进的反神主义和不合逻辑的对话在藏地和其发源地汉地都不是很明显。

传统上，禅在中国汉地的历史表现为不曾中断的传承，它的单一起源可追溯至释迦牟尼佛，然后被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带至中国汉地并以树状分化的模式形成许多不同的门派。现代的学术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将这一传统描绘成像“一串珍珠链”一样的传承，而不是我们在早期研究文献——尤其是敦煌文书中所看到的异源的、分散的、多样化的现象。在二十世纪日本和美国学者的著作中，形成了另一种主要依据敦煌文书所勾勒的关于禅宗发展至公元十四世纪的历史图景。下面是马克瑞在《透过禅：中国佛教禅宗的遭遇、转变和谱系》一书中给出的略表：

前禅时期（Ca.500—600）

早期的禅（Ca.600—900）

中期的禅（Ca.750—1000）

宋代禅（Ca.950—1300）

正如马克瑞所指出的，尽管敦煌文书的年代晚至十一世纪早期，但它并没有提供任

8 马克瑞：《透过禅：中国佛教禅宗的遭遇、转变和谱系》（John McRae, *See through Zen: Encounter, Transformation, and Genealogy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1-21。在本章中关于中国汉地的禅，Zen 或 Chan，我使用后一个术语，因为这是马克瑞普遍使用的，其它的都是大量引用他。

何关于中期和宋代禅的资料信息，这是一个奇怪的、尚未得到充分解释的事实。这至少表明中期的禅的代表人物的成功仅限于特定的区域，而在敦煌，他们及其追随者们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我们在敦煌研究的是早期的禅，而前禅时期只有在传承谱系和早期禅师的实践中才显得较为清楚。对此有两种合理的解释：空间性的和历时性的。从空间性来说，那场后来影响整个禅宗传统的运动是从地方性发展开始的，如马祖（709-788年）和他的追随者，是从中国东南的江西开始的，对敦煌来说遥不可及。直至相当晚的时候，这些地方传承者才对整个中国文化圈产生影响。

第二种解释是，这些运动并不以后期资料中描述的那种方式存在。因此“机锋问答”成为宋代禅的典型特征，并声称代表早期大师们的教法和教授风格。但这可能是一种误导，正如马克瑞所反驳的：

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在公元八世纪到十世纪期间实际发生的活动和事件集合，而是对这些活动和事件的一种追溯再现，是宋代禅宗信徒观念中对唐代神奇人物的身份想象。⁹

因此，如果中期的禅主要是宋代禅的追溯建构，我们就不应期望在十一世纪以前的文献中找到它们。我们在敦煌发现的禅并不一定是边缘化的，而是众多地方化的禅宗实践中的一种，早于十一世纪禅宗正统的出现。在这种没有“禅宗宗派”及各种版本的禅的传承在汉地和藏地流传的背景下，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地方，避免在提及禅宗时它仿佛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产生时代错误。

早期禅的简要历史的勾勒开始于菩提达摩，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模糊形象与其在禅宗传承中的生动呈现相匹配。在六世纪，菩提达摩的追随者和他的中国弟子惠可传播的一个文本叫做《二入四行论》，强调众生同一真性（“理入”），也概述了如何实践（“行入”）。本质上，这个文本倡导一种无修行概念的修行形式，达到“修行六度，而无所行”。

在接下来的世纪中，禅宗以教授《二入四行论》为基础的传承在边远地区发展蓬勃，如黄梅的“东山”法门。东山法门的僧人对修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诠释，包括“看心”。¹⁰七世纪末叶，一位东山法门的传承人神秀（606？-706年），被武则天（690-705年在位）迎至京城，标志着禅宗的地位开始上升并成为中国佛教的主导力量。在两京洛阳和长安

⁹ 马克瑞：《透过禅：中国佛教禅宗的遭遇、转变和谱系》，2003：19。

¹⁰ 《修心要论》归于弘忍（601-774年），但也可能是他的弟子编写的。

活动的神秀是一位影响巨大的禅师，他的许多弟子也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随着僧侣们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禅法吸引了更多的弟子和富裕的施主，禅宗也传播得更广、更多样化。八世纪，在今天的四川省有一群新的禅师和弟子涌现。禅宗在皇宫和寺庙以外的传播主要通过俗众受戒仪式来产生影响，发菩提心（救度众生的大乘誓愿）、证本心即佛。这类受戒是在法坛上举行，常常会有像神会和无住一样有感召力的激进禅师的讲法。神会用他的讲法直接批评像神秀弟子这样有影响的手，对其各种形式的禅修进行了粗鲁的批评。另一方面，无住禅师除了禅修，杜绝所有的宗教活动。因此，到八世纪末，禅法已传遍汉地，也的确传到了西藏，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连续的传统¹¹。

敦煌发现的禅宗写本（汉文和藏文）呈现了九世纪和十世纪一种包容性的、不断发展的状态，汇集了以前大部分的内容。菩提达摩在这里作为禅宗祖师传承的一个重要人物，却不一定是创始人，并且在一系列传承中他根本没有出现。在禅师语录集中也不总是会引用菩提达摩的教言。这些禅师主要来自七至八世纪，既有后来家系中被大家所熟知的，也有很多已经湮没无闻的。尽管文书主要是九至十世纪的，但占主要地位的是那些七至八世纪的禅师（或至少是他们后来的代表）。因此，我们似乎正在通过这些禅师的形象和他们的教法来定义自身的过程中看到一个禅宗的传统。

在敦煌历史场景中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在汉、藏文献中都出现过，那就是众所周知的禅师摩诃衍（Moheyan）。他传教于八世纪下半叶，是继神会对已建立的禅修进行激烈抨击之后那一代人中的一员。摩诃衍所遗留下来的教法显然是试图将前辈所教授的禅法与神会反对坐禅的说辞结合起来。摩诃衍曾依止被神会批评过的禅师降魔藏，后者可能一段时间内还曾经是神会的弟子。他试图调和禅修与佛性本有的理念——只是被修行所遮掩——并与同时代的其他人分享。牛首宗，在八世纪晚期也兴盛起来，它的文本调和了禅修中顿渐之间的明显分歧，包括《坛经》和《绝观论》（后者保留在敦煌藏文译本中）¹²。

如此看来，摩诃衍的教法似乎与八世纪晚期的禅师并无二致。他的著述巧妙地在—个世界观中探讨了禅定的平衡，这种世界观认为佛陀的觉知与普通人没有区别。他在之后的汉地禅宗传统中被遗忘了，但由于历史的巧合，对西藏人而言，他成为了禅宗——

11 神会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征定位为禅之“南宗”，神秀的弟子们为禅之“北宗”，尽管新近的学者们也如此称呼，好像体现了真实存在的历史宗派，但对其差异应该小心对待。关于无住禅师和四川禅宗，参见韦闻笛：《传播的奥秘》，2007。

12 马克瑞：《透过禅：中国佛教禅宗的遭遇、转变和谱系》，2003：56-60。

一般意义上真正的汉地佛教——的唯一代表。

西藏的禅

从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到九世纪上半叶，在佛教被采纳为吐蕃国教的这段时间里，禅师很可能在藏地吸收佛教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不幸的是，我们没有那个时代的记录来确认这一点。在西藏历史中，对禅师在吐蕃王朝活动情况的唯一记载来自晚得多的一个单一叙述，可能是十一至十二世纪，这就是有名的《拔协》，是以一个在佛教传入西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家族名称来命名的。《拔协》的作用是开创了佛教西藏的叙事，同时，在这个叙事中赋予拔氏家族主要的角色。由于它比所描述的事件晚了好几个世纪，显然《拔协》并不是它所描述事件的可靠来源。一份敦煌残卷中关于《拔协》一个故事的描述展示了在几个世纪中它的改变¹³。

尽管不能被当作可靠的历史资料，但是《拔协》中所讲述的有关汉地禅师的故事，当和文书结合起来读的时候非常有趣。在最早的《拔协》的完整版本中，所有这些故事发生在赤松德赞时期，他是吐蕃赞普世系中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他大大地开拓了吐蕃王国的疆域。《拔协》几乎没有讲到他的政治活动，仅提到他将佛教作为吐蕃国教的奠基者角色。在赤松德赞统治初期，佛教在吐蕃处于低谷时期，在许多有权势的家族中不太受欢迎，而赤松德赞在逐渐掌握政权的过程中开始支持佛教，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的一种抵制。在《拔协》中，在赤松德赞统治初期，佛教面临挑战，有一个代表性的事件是，一位来自小昭寺的汉僧被驱逐。不过，这位僧人留下一只鞋，预示着他还会回来。

几年以后，当赤松德赞试图在吐蕃建立一座大型佛寺时，他邀请了印度高僧寂护（Śāntarakṣita）。但是由于地方神的原因，建立寺庙的意图没有成功，僧人也被送回。三个藏人被派往汉地去寻找上师。根据故事所讲，他们遇到了一名叫做金和尚的僧人，对他们进行了指导，并得到了汉地皇帝的接见，皇帝告诉了他们一个关于藏王佛教活动的预言。不论这些会面是否真实发生过，新罗僧人金和尚的出现都很有意思，否则他在西藏就被遗忘了，即使我们拥有的《拔协》是最早的版本，他的事迹仍然非常模糊。不过，正如后面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出现在了敦煌文书中。

在《拔协》中出现的最后一位汉地上师是最重要的，即吐蕃人熟知的“和尚摩诃衍”

13 沙木·冯·谢克、岩尾一史：《敦煌发现的〈拔协〉残卷》（Sam van Schaik and Kazushi Iwao, “Fragments of the Testament of Ba from Dunhuang.”）*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8, no.3, 2008: 477-488.

(名字的第一部分只是相当于汉语中的“僧人”，但藏人用来指代“汉僧”)。摩诃衍是在吐蕃宫廷中非常受欢迎的上师，但是新的问题出现在吐蕃赞普面前，不同的外来佛教上师团体及他们的西藏弟子，两派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根据《拔协》所讲，印度上师教授渐道，在显密教授中循序渐进，逐步证悟；而汉地上师则强调果而不重道，强调简单明了的无念修行，而不是印度上师提供的多种方法。

当印度和汉地两个阵营间的紧张关系演化至暴力冲突时，一些禅宗信徒以自残的方式来表示抗议，并以自杀相威胁，于是赤松德赞召集双方用正式辩论的形式来解决。这场辩论来决定哪个阵营、哪种教授方法将会得到官方支持，哪种将会被禁止。印度一方选取莲花戒(Kamalaśīla)，他是印度佛教学院派的重要人物，倡导渐道。汉地一方定为摩诃衍。《拔协》中有关辩论的片段明显是来自其它材料的建构。《拔协》开始为摩诃衍简短陈述，是关于早期禅的片面论述，仅仅阐述思想上的顿悟，而忽略如何在实践中证明这一点。这一简短陈述为长达几页关于渐修有效性的冗长论证进行了铺垫，后面这些论证来自莲花戒的著述。直到论辩结束，一直没有听到摩诃衍的发声，表明他承认失败。

在《拔协》中，摩诃衍的失败导致赤松德赞全力支持渐修和教授这种方法的印度僧人。这一事件之后紧接的是翻译机构的成立，所有的佛经被翻译成藏文。这种紧接表明叙述这场辩论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赋予印度上师和其吐蕃弟子正统性，这些弟子们翻译了大部分的藏文佛经。后来，随后出现的《拔协》的各种版本和其它宗教史书利用这场辩论进一步更清楚地阐明，印度才是佛经的唯一有效来源，而汉地的是可疑的，因为它与摩诃衍的顿门有关¹⁴。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如果认为《拔协》中的这段记载有任何纪实价值，那就太天真了。尽管它在西藏已被广泛接受，但在其他早期藏文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发现，当它开始出现在其他作品中时，显然《拔协》是唯一的原始资料来源。不仅如此，这个故事在藏族人的宗教生活中有着实用的功能。它不仅证实从印度带到西藏的新传承体系是唯一真正的佛教源头，而且也证实宗教实践的重要性，来反对那些强调佛性本有，顿悟成佛之人。因此，这个辩论故事在西藏的最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在随后几个世纪

14 这是巴瑞菲特的一种推测，见氏著：《桑耶寺“大论辩”：一个藏传佛教神话的建构与解构》(Sven Bretfeld, “The ‘Great Debate’ of bSam yas: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a Tibetan Buddhist Myth.”) *Asiatische studien/ Études asiatiques* 58, no.1, 2004: 15-56。

结益西 (ལུང་མངས་རྒྱལ་ཡེ་ཤེས) 写下了《禅定目炬》，是为数不多的经历了吐蕃崩溃后的战乱仍然幸存了下来作品。在这本书里，禅宗“顿悟法”被认为是真正的佛道，但是位于开悟方法四个层级中的第二级，这四个层级依次为渐修、顿悟、摩诃瑜伽和阿底瑜伽。特别是，桑结益西担心藏人将禅和阿底瑜伽相混合，正如我们在后来会看到，敦煌写本的证据表明确如此。

无论如何，从几个资料来源看，包括敦煌文书，卫藏藏族佛教徒像桑结益西的著作，都强烈暗示，禅宗在九世纪末叶并没有像后来的辩论故事中所说的那样被藏人废止。正如我们在下面章节中所看到的，来自敦煌的证据表明，吐蕃的禅宗传承在十世纪仍然盛行，甚至到十一世纪时他们依然也活跃。据说安多上师阿荣·益西迥乃 (ཨ་རོང་ཡེ་ཤེས་འབྲུང་གནས) 有两支传承，一是中国汉地的，一是印度的。禅宗文本中的内容在十二世纪时仍然为人所知，如娘若·尼玛沃色 (ཉང་རལ་ཉི་མ་འོད་ཟེར) 在他的西藏佛教史中就讨论了几部关键的禅宗著作。

我们没有什么历史资料能让我们对禅宗在西藏的消亡做出任何肯定的判断。因此，我推测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压力——十一世纪以来，来自印度的新的修行传承被像萨迦班智达一样有影响力的学者和作者介绍进来，导致了吐蕃禅宗的衰落和最终让位。以印度传承为基础的新派 (གསར་མ) 咄咄逼人，宣扬印度是正法的唯一来源。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接受汉地禅宗传承的人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但似乎禅宗的文本和修行仍然传承到了十三世纪，当时萨迦派大师袞旁·却扎贝桑波 (ཀུན་མཁའ་ཚོས་གྲགས་དཔལ་བཟང་པོ) 仍在教授禅宗。晚至十七世纪，历史学家多罗那他 (བུ་ར་བུ་མ) 读到一本藏文禅宗论书《八十经续源》(མདོ་ལྷེ་བརྒྱད་བརྩུབས) ，不过这些似乎是十分罕见的例子了，距离禅宗在西藏宗教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已经过去很久了¹⁸。

18 关于岗波巴及其弟子教法中的禅的元素，参见马休·凯普斯坦：《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皈依、竞争与记忆》(Matthew Kapste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Conversion, Contestation, and Memory*)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75-78。关于袞旁的禅宗教法和多罗那他《八十经续源》的评论，见斯替楞斯：《印度大班智达威月的生平及其西藏遗产》(Cyrus Stearns, “The Life and Tibetan Legacy of the Indian Mahāpaṇḍita Vibhūticandr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9, no.1, 1996: 149, 注释 78。多罗那他认为这个文本是摩诃衍的著作，当时禅宗的影响在西藏总体趋于衰弱，于是将所有的禅宗文本归于唯一的西藏著名的禅宗大师。还可参见明耐特：《西藏批判顿门的传说：12世纪娘·尼玛沃色〈教法源流·花蜜精粹〉中的六个顿门主题》，载《藏传佛教文献与实践：900-1400年形成期的研究》(Garmen Meinert, “Legend of Cig car ba Criticism in Tibet: A List of Six Cig car ba Titles in the Chos 'byung me tog snying po of Nyang Nyi ma 'od zer (Twelfth Century).” In *Tibetan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Praxis: Studies in Its Formative Period 900-1400*, eds. Ronald Davidson and Christian Wedemeyer) , Leiden: Brill, 2006。

敦煌的禅

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是，敦煌距离当时中国的权力中心，如有许多佛教寺庙的都城长安（唐代）、开封（宋代）、还有洛阳，都非常遥远。索罗森（Henrik Sørensen）提出，在敦煌出现的禅宗和后来资料告诉我们的九至十世纪中原的禅宗之间的差别，在于敦煌和这些中心地区之间的遥远距离，以及八世纪晚期敦煌被吐蕃军队占领后与中原的隔绝¹⁹。

然而，这种隔绝或许被夸大了。九世纪中叶，吐蕃对敦煌的控制被打破之后，汉僧往来于敦煌和中原之间。我们有悟真（816-895年）的例子，他在返回敦煌之前，曾到长安觐见了皇帝。我认为我们应该将敦煌文书当作禅宗地方传统的一部分，它或许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我们也认为所有的禅宗都是地方性的。如果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发现同一时期的其他文书收藏，那么，敦煌文书的地方特征就会更明显，他们内容上的差异、与后期传统所描述的禅宗之间的差异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反常。再者，学者们也许更谨慎地使用敦煌文书作为“唐代禅宗”的直接材料，这将不会是一件坏事²⁰。

由于只有少数几件敦煌禅宗文书有明确的日期，所以很难确定它们缮写的时间。上山大峻（Daishun Ueyama）将这些文书划分为三期：（1）汉文文书，大约为750-780年，或者是从中原带过来，或者是书写在外来的纸上；（2）吐蕃占领时期的汉文、藏文文书，大约为780-850年，书写在当地生产的纸上；（3）汉文文书，从九世纪晚期到十世纪，书写在当地生产的纸上。这一分期也仅仅是针对于汉文文书。吐蕃的控制切断了唐代通向中亚的贸易路线，也可能阻止了来自中原的文书传入。即使后来吐蕃王朝崩溃，敦煌及其周边地区重又回到当地汉族统治者手中，也再没能恢复至吐蕃占领之前的境况，因为当时唐王朝也已势力甚微，并在十世纪初最终覆亡²¹。

然而，上山大峻的分期是建立在对吐蕃禅宗文书的误解之上的。像大多数先前关于

19 索罗森：《敦煌汉文禅宗写本特征的观察》（Henrik Sørensen, “Observation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han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Studie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n Religions* 2, 1989: 135。

20 关于这一材料的更多研究梅维恒做过，见梅维恒：《学仕郎与俗语叙述故事的抄写：敦煌写本目录》，1981；《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Victor Mair, *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关于汉文敦煌通俗文学的总结，见施密德：《敦煌文学》，载《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Neil Schmid, “Tun-huang Literature.” 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 Victor Mai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982-987。

21 上山大峻：《敦煌禅宗的方方面面》（Daishun Ueyama, “Tonkō ni okeru zen no shosō.” [Various aspects of Chan Buddhism in Dunhuang]），*Ryūkoku daigaku ronshū* 421, 1982: 88-121。

吐蕃禅宗的研究一样，他认为这些文献资料的时间是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但是大量的敦煌藏文资料现已被推断是在吐蕃占领结束之后。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吐蕃禅宗幸存到了十世纪甚至更久。敦煌藏文禅宗写本的时间与大多数汉文本的时间完全相同，即九、十世纪，并且也是地方性的，在这一事实的启发下，我们不应将那时的吐蕃禅宗和中原禅宗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传统，而是禅宗实践以两种语言呈现了出来。

那么，是何人在敦煌修习禅宗？当时没有专门的禅宗寺院，因此，这里和汉地其他地方一样，禅宗是在佛教寺院中混杂于其它佛教实践中被教授和修习的²²。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时，对于一些现象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如发现许多包含有禅宗文本的文书中还包含有其它传统，有些文本似乎是禅宗和其它传统的合并。与其将这视为“混合的”或者“融合的”禅宗现象，还不如考虑禅宗作为一种流派其特点还不够鲜明，其文本还不能从其他宗派文本中独立出来，成为规范。

敦煌藏经洞中，大概有 300 件文书包含汉地禅宗的文本，有 50 多件包含吐蕃禅宗的文本，它们所包含的文本的范围是相似的：²³

1. 伪经及其注疏。这些经文被认为是由禅宗人士所作，其中有一些被从汉文译为藏文。
2. 用问答的形式来反映禅宗教义的论，答复者通常引证佛经来阐释教义并维护其立场。有些论的出现更像是对话，与后期禅宗传统中的“机缘问答文本”（*encounter texts*）非常相似。
3. 探讨禅宗传道讲法和禅定，或阐释顿、渐问题的论。这些有时但并非总是由具名作者所作。
4. 禅师的语录，常常是几个大师的选集。
5. 某一传承中大师们的记述，经常包含上述第 1、2、3、4 的内容。
6. 悟道诗²⁴。

22 一条非常罕见的禅宗寺庙的记载见于 Pelliot Chinois 2292 号写本的后记中，年代为 947 年。不过，这座寺庙是在四川被提到的，见梅维恒：《学仕郎与俗语叙述故事的抄写：敦煌写本目录》，1981：11。也有一些僧人自称是“禅僧”的例子，如 Pelliot Chinois 3051 号写本。

23 最完整的汉文禅宗写本目录见柳田圣山：《禅籍解题》，载于《禅家语录》2（Seizan Yanagida, “Zensekai Kadai.” In *Zenke goroku II*, eds. Nishitani Keiji and Yanagida Seizan, Tokyo: Chikuma shobō），1974: 445-514。最完整的藏文禅宗写本目录见沙木·冯·谢克：《藏文禅宗写本：敦煌写本中的藏文禅宗文献完整目录》（Sam van Schaik, *The Tibetan Chan Manuscripts: A Complete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ibetan Chan Text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Collections*），Papers on Central Eurasia 1 (4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2014。

24 另一个类似的主要是汉文禅宗写本的目录见索罗森：《敦煌汉文禅宗写本特征的观察》，1989：118-120。

上述关于不从上下文中提取文本的论点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像这样的分类是有益的，但如果我们不立即返回到这些文本被提取的原文中，就会产生误导。当这样做时，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是，这些文本很少单独被复制到文书中，它们通常作为文本汇编中的一部分被复制或引用。因此，我们也要注意文本通常并不会被当作“禅宗文献”本身，例如《金刚经》（在 Pt.116 中）、一部佛教禅定的一般性阐释（在 IOL Tib J 709 中）、或一部佛教哲学观的论（在 IOL Tib J 121 中），当他们在这些汇编中被发现时都毫无疑问是禅宗文本。一部很有趣的汉文文书汇编（Or.8210/S.4037），包含有禅宗的材料，以及在诵经后为积累功德的祈祷文、《妙法莲华经》的颂词、各种场合用的咒语，另一面有当地一个世俗佛教社团的通告。类似这样的文本汇集告诉我们，文本类别的区分与人们实际的生活和实践几乎没有什么关系²⁵。

因此，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文书用途的列表，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功能。下面是一个关于敦煌佛教文书用途的不太完整的尝试性列表：

- * 团体灌顶仪轨，如先前所讨论的 Pt.116 号写本等；
- * 讲法，在小的团体或大型集会，如灌顶仪轨；
- * 各种世俗需求的仪轨表演（如治病、葬礼、占卜等）；
- * 日常诵读或修行所用经文和其他文本，个体的或团体的；
- * 徒众的笔记和书写练习；
- * 交流辅助，如词汇表和单词书；
- * 仪式活动的“收据”，诸如赞助或抄经；
- * 护身符和辟邪物；
- * 古物收集。

绝大多数汉文禅宗文书的书写都是草体，有些是潦草的手写体，常包含有错误，这表明这些不是由专业抄写员为施主而作，就像很多佛经写本那样。绝大多数的禅宗写本更像是由弟子和禅师们为了上述列表中的功能而作。我们可以通过仔细研究藏文写本的书写风格来进一步了解。我在其他地方曾经尝试过对吐蕃时期（即九世纪中期以前）藏文写本中最常见的书写风格进行分类，并与晚期写本（九世纪中期到十世纪）的风格进行比较。一些特定的书写风格，加上其它古老的特征，可以让我们将一些没有年代的文

25 另一个对于理解禅宗的实践性和仪式性特征有用的写本目录包含有著名的《禅定十二小时》，参见饶宗颐、戴密微：《敦煌曲：八至十世纪唱本》（Jao Tsong-yi and Paul Demiéville, *Airs de Touen-Houang: Textes à chanter des VIIIe-Xe Siècles: Manuscripts reproduits en facsimilé*），Paris: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71。

书归于早期；它们中有些文书的书写风格具有十世纪晚期到十一世纪早期敦煌文书晚期阶段的特点²⁶。

藏文禅宗写本的书写质量存在很大的差异。像 Pt.116 和 IOL Tib J 710 书写认真、均匀的写本同书写潦草的写本如 Pt.121 相比，两者显然来自不同的语境。前者是作为贵重物品被造出来（这与它们在仪轨中被使用不矛盾），而后者可能是个人的抄本，是学徒在听讲过程中的抄写，或从其它模本抄写而来²⁷。有时候也可以辨认出个人的书写风格，这向我们表明各种手抄文本是来自于同一个缮写禅宗文书的抄写员之手。这也提醒我们“禅宗文本”这一分类是人为地、有点武断地为众多的写本收藏划了一个线，参与创作和使用这些写本的人们同时也在创作和使用其他类型的佛教写本。

我们正在思考的这些功能与所讨论写本特别的物质形式之间是否有联系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虽然在文本研究中，有关文本的用途与其物质形式之间的联系讨论得并不多；但是在没有文本的情况下，人类的实践只能从物品本身来推断，这是考古学的核心。这种对文本物质性的关注同样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文本的人工制品属性，在这个例子中，“人工制品的机械特性会在特定的社会实践中启用或限制他们的使用”。²⁸ 用不太专业的技术术语来说，物品的设计方式和人们使用它们的方式是“契合”的。

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很有用的方法，那就是关于“可供性”的概念。一个物体的可供性是它使人们能够用它来实现：一个长度适中的细长物体可供挥动，一个坚硬的带着锋利边缘的物体可以用来剪切和刮削，一个可抓住的坚硬物体可供扔投，一个细长有弹性的物体可以用来捆绑，等等。当物体的设计是为了越来越明确的目的，它们的可供性也就变得更加明确。因此，“可供性”包括人和物品，社会及其人工制品。我们想要试图理解文本作为修行的用途，可以看一下写本的物质特征，他们可供什么样

26 沙木·冯·谢克：《早期藏文写本断代：一种古文书学的方法》，载《早期吐蕃与敦煌的抄经生、文本和仪式》（Sam van Schaik, “Dating Early Tibetan Manuscripts: A Paleographical Method.” In *Scribes, Texts, 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 eds. Brandon Dotson, Kazushi Iwao, and Tsuguhito Takeuchi），Wei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13: 119-135。

27 在其他的研究中我认为像这样的写本显示出是据口述资料写下来的迹象，见沙木·冯·谢克：《口传教法与书面文本：在敦煌的传播和转变》，载《西藏文化史论文集》（Sam van Schaik, “Oral Teachings and Written Texts: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Dunhuang.” In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 eds. Matthew T. Kapstein and Brandon Dotson），Leiden: Brill, 2007: 183-208。

28 琼斯：《科技考古与物质性：基于材料的理论与实践分析》（A Jones, “Archaeometry and Materiality: Materials-Based Analysis in Theory and Practice.”），*Archaeometry* 46, no.3, 2004: 335。

的活动²⁹。

大多数敦煌藏文文书既有卷轴装、梵夹装（像贝叶经形式），也有经折装（折叠起来的）和线装书（手抄本）。我们考虑一下哪一种书的形式最适合传道讲法和灌顶仪轨。对于像 P.t.116 的写本来说，选择经折装形式是有一定优势的，它包含了一些在仪式中使用的有特定顺序的文本。梵夹装可能会使文本顺序混淆，但经折装就能够保持页面和文本的正确顺序。即使你正在从你的材料中提取或者概括，知道你在仪式中所处的确切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个人的诵读实践是怎样的呢？如果一个人坐在被放好的文本面前诵读，那么卷轴装、梵夹装或经折装都是可以的。卷轴装需要不停地手动卷起、打开；而梵夹装和经折装只需要每两页翻一次。梵夹装对于这类目的可以提供最大的可供性，因为散页的纸张可以简单地平放在座前。对于做笔记和其他特别的书写实践来说，线装书和小型的经折装便于携带，便于查找文本，当站立或坐着没有地方放书时，可以拿在手里。但是，当你坐着或站在写本的支撑台前时，线装书的形式就不太合适，它们不容易平放，书页也需要经常翻动。其他用途可能与不同的形式有关，例如，护身符通常采用带有宗教文字或咒语的小纸条的形式。

对某些人来说，这些细节似乎太过繁琐，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活动——诵读、讲法、做笔记、举行仪式等——都是文本产生的生活形式。文本功能只在他们的物质实例中作为单个写本起作用，只有在人和人工制品的集合中以及将二者绑定在一起的实践中，我们才能最好地理解它们。

◆ 作者：[英]沙木·冯·谢克 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和东方事务部研究员

译者：牛宏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寇金花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级宗教学硕士研究生

校订：张长虹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研究员

29 詹姆斯·吉布森发展了可供性的概念，见氏著：《生态学的视觉论》（James Gibson,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后来，唐纳德·诺曼在可供性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日常心理学”，专门将之应用于人工制品的设计，如门，见氏著：《设计心理学》（Donald Norman, *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London: MIT press, 1988。蒂姆·英戈德又将可供性的概念广泛应用到历史和文化上，见氏著：《感知环境：生计、居所和技能论文集》（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London: Routledge, 2000。

ABSTRACTS

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P.t. 1077: A Statement of the Claim Concerning To tog's Female Slave

LU Li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Dunhuang manuscript P.t. 1077: A statement of the claim concerning To Tog's female slave, the To Tog was Du Dudu 杜都督, the governor when the Tibetans ruled Dunhuang and his name was Do stag skyes. The manuscript can be dated to A.D. 790-820. The manuscript involves a reply statement about the ownership of a female slave between Du Dudu and Rlang khri bu, a Tibetan. The judge was the Zha che pa of the Guazhou jiedushi office. The case was first heard in Shazhou, and Du Dudu won the case, then Rlang khri bu appealed to the Guazhou jiedushi for retrial. The document reflects the way in which the Tibetans drew lessons from the Tang dynasty's legal code and sheds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and Tibetan people when the Tibetans governed Dunhuang.

A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in the Dunhuang Tibetan Documents of *Madhyamaka* and its Features Based on the Tibetan Collection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Renqing Ji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about forty Tibetan document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subject of Madhyamaka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Dunhuang Tibetan documents in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se manuscript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rong pages, missing pages, mixed pages, contents that do not correspond to previous pages etc. Nevertheles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s the collections of these documents into seven categories based on a comparison with the Tanjur. Most of materials can be found in the Tanjur except the seventh type, “explanation of Madhyamaka texts” (*Dbu ma'i gzhung bshad*). Few materials bear different translations from that in the Tanjur such as the *Yi ge brgya pa zhes bya ba'i rab du byed pa tshig le'ur byas pa*, *Yi ge brgya pa'i rab du byed pa rnam par bshad pa*, and the *Dbu ma rtsa ba'i 'grel pa ga las 'jigs med*.

A Comparison of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Versions of the *Vimalakīrti sūtra* during the Tubo Period

Yangben Jia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When the Tibetans governed the Silk Road, the *Vimalakīrti sūtra* was widely copied in Tibetan and Chinese. The *sūtra* contained in the Kanjur corresponds to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ound in Dunhuang and corresponds to the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by Zhiqian, Kumārajīva and Xuanzang in terms of chapters and content.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Ra mo che in Lhasa

LIU Fengqiang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ibetan legends, the Ra mo che temple was built by Princess Wencheng. This statement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s, but it was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of historical records in Chinese and Tibetan, the Ra mo che was originally a palace built by Srong btsan sgam po for Princess Wencheng. Wencheng expanded it later to dedicate the statue of Śākyamuni. After the death of Wencheng, the Han Chinese monks lived there for a long time, and it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temple. In the Ming Dynasty, Altan Khan had statues of the Buddha built that imitated the twelve-year-old Śākyamuni image in the Ra mo che and built a temple for the worship of the statue. The Mongol term for temple is *jo* and is derived from *jo bo* and reflects the name of the eight-year-old Śākyamuni-Jo bo statue. The character *zhao* in the name of the Xiaozhao temple in Chinese is derived from Mongol via Manchu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us the name of the Xiaozhao Temple and its origins reflect the close historical exchange among Tibetan, Mongolian, Chinese, and Manchu cultures.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Monastery Based on Bshad sgra Dbang phyug rgyal po's *Bsam yas Annals*

Lhun grub rdo rje and CUI Yu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Bsam yas was the first Buddhist monastery built in Tibet under the patronage of King Khri srong lde btsan. The monastery was modeled on the design of the Odantapuri monastery of ancient India.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ibetan architec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evere fire in 1816 and an earthquake in 1847 destroyed most parts of the monastery. Two ministers (*bka' blon*) from the Bshad sgra family presided over the restoration work. Bshad sgra Dbang phyug rgyal po (1795-1864) wrote a work titled *Lugs gsum mi 'gyur lhun gyis grub pa'i gtsug lag khang rten dang brten par bcas pa legs gso'i sri zhu ji ltar bsgrubs pa'i tshul gyi khyad par brjod pa'i dkar chag skal bzang dad pa'i sgo 'byed* (abbreviation: *Bsam yas Annals*), which records the detailed process of the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monastery. The Bshad sgra family received a great reputation for their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and other ancient places.

对十力吉祥友及其《有为无为抉择》时代的简注

范德康

(哈佛大学)

十力吉祥友(Daśabalaśrīmitra)以其长篇论著《有为无为抉择》(*Samskṛtāsamskṛtaviniścaya*)而颇为闻名,但他的大致年代却一直不太明确。如今发现他著作中的一些的简短段落涉及到克什米尔学者释迦室利贤(Śākyaśrībhadra, 1127-1225年)的生平,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位学者的活跃时期。

拶也阿难捺和贡却僧格生平考补

聂鸿音

(四川师范大学)

拶也阿难捺是克什米尔人,贡却僧格是一名藏族喇嘛,他们于12世纪下半叶进入西夏。藏文史书简要记载了其生平,但没有记载他们在西夏的具体传教活动。本文旨在考察他们所传的教法,以便窥见藏传密法在党项王廷的地位,其间首次尝试把贡却僧格勘同西夏文献里的经师宝狮子。考察证明党项王廷对显教经书的兴趣远大于密教修行法。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the first Paṅ chen Lama Mkhas grub Dge legs dpal bzang po (1385-1438)

Sha bo klu rgyal and Dpa' mkhar skyid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Mkhas grub was one of the disciples of the Tsong kha pa and is considered the first Paṅ chen Lama. There is a voluminous literature about his life, including more than ten biographies. Among them, the biographies written by Se ra Rje btsun Chos kyi rgyal mtshan (1469-1544) and Yongs 'dzin Ye shes rgyal

mtshan (1713-1793) exercis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the latter is given an annotated Chinese translation. It also includes a description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this biography and corrects some mistranslations in presently existing Chinese translations.

Overview of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the Paṅ chen Lamas

LI Ruohong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In this introductory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publications on the Paṅ chen Lama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the author makes an effort to combine and annotate papers and monographs published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on the topic to illustrate the landscape of the narrowly focused and widely scattered studies of the Paṅ chen Lamas. With a comparatively detailed narrative on the readily available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point of departure for future research undertakings on the Paṅ chen Lamas from broader and more diverse academic perspective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further opening and availability of first-h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ival materials in Tibetan and other languages.

A Study of the Thangkas in the Main Hall of the First Floor of the Baoxianglou

WEN Ming

(The Palace Museum)

The Baoxianglou 宝相楼, Building for Images of Buddhas, that is located in the garden of the Cininggong 慈宁宫, was built in the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originally the east side hall of the Xianruoguan 咸若馆 and it was changed 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in the 30th year of Qianlong (1765) to become one of the eight "Buddha buildings in six-sections" 六品佛楼 in the Qianlong period. It was officially named *baoxianglou* in the 37th year of Qianlong (1772). A set of thirteen thangkas was hung in the main hall of the first floor of Baoxianglou. 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Handicraft Works*, these thangkas were painted in the 31st year of Qianlong (1766). Although the original placement of the thangkas has been lost, according to three precious photographs that were taken in 1957, combined with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back of the thangka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store their original hanging order.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ules and reasons of the sequence and layout of Arhats in the Qianlong period and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angkas in the eight "Buddha building

in six-sections".

A Yak-Pattern Bronze Mirror with an Iron Handle Housed in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and Related Issues

XUE Jiang

(Ph.D of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Focusing on the yak pattern bronze mirror with an iron handle that is housed in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milar mirrors that were previously found in Tibet and her peripheral regions, as well as earlier domestic and foreign collections of this kind in terms of pattern design, shape, material and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age of this Tibetan bronze mirror with a handle roughly date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o the en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ts shape is influenced by the bronze mirror with a handle of the Eurasian grassland, and the decorative pattern has more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example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Bronze Culture in Tibet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cultural influences.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of the Biography of Bka' blon Zur khang Sri gcod tshe brtan (1766-1820)

Gyung drung 'gyur m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Liuwu New District, Lhasa)

This article is an analysis of a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in Guide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It records the biography of the famous nobleman and Bka' blon Zur khang Sri gcod tshe brtan (1766-1820). The biography contains two sections. The first is an autobiography, and the second is a posthumous extension of th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by his family's descendants. The biography covers the entire life of Zur khang Sri gcod tshe brtan, including his entering government service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his promotion to the position of Bka' blon, his being stationed at the border, his resignation from his position, becoming a monk, and his passing. Besides his political career, the text narrates his personal religious life and social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Zur khang family and Sri gcod tshe brtan's life while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ibe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 Study of the Author, Sources and Value of the Book *Weizang tuzhi*

YANG Xuedong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foreword by Zhou Qi 周琦, the authors of the book *Weizang tuzhi* 卫藏图识 were Ma Yang 马扬 and Sheng Shengzu 盛绳祖. Its authorship by Ma Jie 马揭 and Sheng Shengzu is wrong. In term of the content, the part of *Fanmin zhonglei tu* 番民种类图 of the *Weizang tuzhi* was compiled from the *Huang Qing Zhigongtu* 皇清职贡图 and the source of the *Chengzhantu* is unidentified. The two volumes of the *Shilue* 识略 mainly compiled from the *Xizang zhi* 西藏志. The book mainly copied the *Xizang zhi* and inserted some characters from other books with slight additions and adaptations. The proper selection of materials and reasonable layout made the *Weizang tuzhi* famous and was frequently quoted in later works of Tibetan studies in Qing dynasty. It has also been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French, and English languages.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s Early Activities of Trying to Enter Tibet in the Middle 19th Century

LIU Ruiyun and SUN R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From 1849 to 1852,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actively prepared and twice tried to enter Tibet via Bhutan to preach Christianity in Tibet from South Asia. At that time, the strong expansion of British Indian colonial forces to the north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nd the ensuing wars affec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areas near Tibet and led to their stagnation. As a result, the hostility and resistance of the local officials and people towards the western world came to be deeply rooted in their minds. Thus, the early activities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of trying to enter Tibet through Bhutan encountered unprecedented resistance and ended in failure.

A Review of Several Tibetan Textbooks — and the Approaches to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Tibetan

MA Zhouyang

(Ph.D Candidate, Harvard University)

A fine and efficient educational framework of Classical Tibetan can provide the circle of Tibetan Studies with many more proficient prospective scholars. Ideal textbooks and equitable educational approaches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his framework. This article reviews seven common textbooks of Classical Tibetan and compares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Tibetan language learning. Of course, no single textbook can cover the entire course of Tibetan language learning. The teacher is supposed to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textbooks during teaching and single out the most appropriate pieces from them to pair with various learning phases. In terms of course design,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points. First, teaching grammar should be done independent of the reading of texts. Second,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e teacher should follow the order in which the Tibeto-Burman perspective proceeds after the Indo-Tibetan one. Third, the teacher should hold the teaching of syntax as primary.

Succession and Marriage and the Tibetan Royal Line

Brandon Dotson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Xu² and WU Xianyun³,

Proofread by YANG Ming⁴

(1. Georgetown University; 2. Hebei University; 3.4.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d other Old Tibetan source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succession from one emperor to another was not as simple and clear as what one finds in the transmitted lists of Tibetan emperors. The Tibetan emperor was at the center of a vast network of brothers, half-brothers, maternal relatives known as *zhang*, and royal grandmothers, mothers, aunts, sisters, and daughters who acted as important agents in Tibet's relations with vassal kingdoms such as the Tuyuhun and also with foreign kingdoms such as the Türgiś. These ties of ki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his patrilineal and matrilineal relatives involved both partnership and conflict, and the Tibetan empire developed processes to reduce the danger posed by rival brothers and half-brothers on the one side, and to reduce the threat that an emperor might face, especially in his youth, from his mother's clan on the other side. Inversely,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absorbing a foreign kingdom into the Tibetan Empire was not only to send a Tibetan princess to a vassal ruler in dynastic marriage, but to ensure that she gave birth to the heir to that vassal kingdom's throne. By the same token, no foreign princess was ever allowed to serve as the chief

queen of Tibet or to give birth to a Tibetan crown prince.

Tibetan Zen: Discovering a Lost Tradition

*Sam van Schaik*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NIU Hong*² and *KOU Jinhua*³,

Proofread by *ZHANG Changhong*⁴

(1. The British Library; 2. 3.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4. Sichuan University)

As the introduction to Sam van Schaik's book *Tibetan Zen*, the chapter examined a lost Buddhist tradition—Tibetan Chan, which was censured in Tibet and forgotten in Central China. To approach the Tibetan Chan manuscripts, our reading of texts should happen without discarding the physical manuscript, which means seeing all texts as practices.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Chan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present an inclusive and evolving situation during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ringing together most of what had gone before. It is likely that Chan teachers played a role 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period when Buddhism was adopted as the imperial religion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h century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Moheyan, the Chan master who remained well known in Tibet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instantaneous” approach; However 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allows us to reconsider the result and the way of the so-called “Bsam yas debate”. The accounts of the Tibetan historical sources, such as the *Testimony of Ba* might have limited documentary value. It seems that Chan texts and practices were being transmitted as late as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oth the Chan in Tibet and Dunhuang, just as those Chan traditions in other places of China, were part of a local tradition.

The Rock Art of Spiti — A General Introduction

*John Vincent Bellezza*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Yongbao Zang*²

(1.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The rock art of Spiti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conducted in 2015, the author documented most of the ancient rock carvings and paintings in Spiti.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ontents,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and chronology of this rock art. The work also makes som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and raises conservation issues concerning rock art sites in Spiti.

Embedded in Stone — Early Buddhist Rock Art of Ladakh

Phun tshogs rdo rje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Zhongya²

(1. Independent Scholar; 2. Tibetan Culture Museum at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Limite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art in Ladakh, the early rock sculptures and inscriptions can throw some light on early art-historical aspects of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presented the rock carvings which are grouped into several geographical areas of Kargil, Leh and Nubra. These were surveyed and documented by the author during the years 2001-2008. Based on these materials, the author made a detailed comparison with Kashmiri metal sculptures of the ninth to twelfth centurie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Ladakh and her neighboring regions.

JOURNAL OF TIBETOLOGY (VOL.24)

Edited by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ISBN 978-7-5211-0356-4
First Published in June 2021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学学刊. 第24辑 /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21.6

ISBN 978-7-5211-0356-4

I. ①藏… II. ①四… III. ①藏学—文集 IV. ①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23899 号

藏学学刊 [第 24 辑]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主编

责任编辑 张荣德

藏文审校 周加克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2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40 千字

印 张 23.5

定 价 9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211-0356-4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